



千亩之战析疑*

杜 勇

摘 要:千亩之战是周宣王晚年征伐姜氏之戎的一次著名战役。近出清华简《系年》亦载其事,从而引发学者对战争的次数、地点、起因与影响等问题聚讼不已,疑云迄未消除。仔细分析地上地下各种文献,可知《史记》并无两次千亩之战的说法,实只宣王三十九年一次战役。战争地点在周都镐京近郊,与晋地无涉。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周王室支持秦人打击犬戎(獯豸),以安西垂,结果姜氏之戎连带遭到秦人追逐,土地也随之丧失,从而引发了姜戎氏对周王室的尖锐矛盾,进而升级为武装冲突。战争未能打败姜戎氏的进攻,反而是王师败绩,天子奔逃。周王室权威扫地,共主地位一落千丈,无形中助长了犬戎长期觊觎宗周的政治野心。十多年后,申、缙联合犬戎攻破镐京,赫赫宗周终于一朝覆亡。

关键词:千亩之战;战争次数;地理方位;起因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K22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5-0065-07

千亩之战是周宣王晚年征伐姜氏之戎的一次著名战役。战争在镐京近郊进行,周王室占有天时地利,结果不仅未能打败姜戎的进攻,反而是王师溃退,奄父快马驾车才使天子脱逃。周王室权威扫地,共主地位一落千丈,统治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无形中助长了犬戎伐灭宗周的政治野心。然而,关于此役的次数、地点、起因及影响等问题,学者多有分歧,即使清华简等新出文献的问世,也未消除重重疑云。本文拟就此略作探索,以期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

一、千亩之战的次数

千亩之战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学者的认识各有不同。今人杨伯峻先生继日本学者竹添光鸿之后,力主千亩之战有二:一在周,未言地望;一在晋,地即岳阳。晋地之战“前于周宣王

之役十三年,且晋战而胜,与周宣王之战而败者不同”^①。杨宽先生引为同调,认为晋穆侯十年之役“当是另一次千亩之战”^{[1]573}。清华简《系年》记“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整理者认为此役在周都附近,与“晋穆侯千亩之战的千亩在今山西并非一地”^②,坚持千亩之战分为两次。但也有学者旗帜鲜明反对此说,认为宣王时千亩之战只有一次,两次说是错误的^③。其是非曲直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千亩之战两次说的依据来自《史记》。其《周本纪》说:

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此条史料当取材于《国语·周语上》,且与近出清华简《系年》相印合:“(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传世文献与地下材

收稿日期:2021-07-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勇,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主要从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献研究。

料交相印证,是无可疑。所谓另一次千亩之战见于《晋世家》: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

此一记载主要取材于《左传》桓公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此记穆侯千亩之战并未系年,而《史记·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却推为晋穆侯十年(周宣王二十六年)。其依据何在?很可能是《晋世家》所说:“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年表》拟定昭侯元年为平王二十六年,此前文侯在位35年,再往前是殇叔4年,穆侯27年,故可推得桓叔(成师)生于晋穆侯十年(宣王二十六年),亦即穆侯“伐千亩”的年代。虽然司马迁说“靖侯已来,年纪可推”^{[2]1636},但他所推晋献侯、穆侯、文侯的在位年代实际都存在问题(容后详论),即使桓叔封曲沃时的年龄不误,也不能说明晋伐千亩必在穆侯十年,不能证成千亩之战两次说。

从前人们不曾注意,司马迁本人并未将千亩之战视为两次不同战役。《周本纪》《晋世家》言及千亩之战,虽在晋穆侯与宣王的年代对应上两不相谐,但《年表》只列晋伐千亩一役,对宣王三十九年败绩于千亩只字未提。王师败绩于千亩,事态更为严重,远非晋侯“伐条”“伐千亩”等战役可比,没有不入《年表》的道理。如若千亩之战确为名同实异的两次战役,司马迁制作《年表》之时,当如宋元时期《通鉴外纪》《通鉴前编》一样,前后分列,划然两事,而不会有此疏漏,顾此失彼。至于千亩之战在纪年上的抵牾,司马迁未必不知,只因一时难于厘清,就只好以客观审慎的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505}。

在中国早期历史年代学研究上,司马迁是有卓越贡献的。特别是西周共和以后年代的整理和厘定,使中国历史从此开始有了确切纪年,确是司马迁一项杰出的学术成就。但西周年代学研究极为复杂,涉及面广,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十二诸侯国的年代资料多寡不同,事与年的系联,侯年与王年的对应,很难做到准

确无误,甚至有时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也无从调适。例如,《史记·陈杞世家》说:“(陈)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依此推算,共和行政就不是14年而是17年,而共和元年在《年表》中对应的也不是陈幽公十三年而是十四年,宣王元年对应的不是陈釐公六年而是五年。又如《鲁世家》说鲁武公九年卒,《年表》却出现鲁武公十年;说“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叛)周,犬戎杀幽王”,《年表》却将此事记在孝公三十六年,竟相差11年。可见司马迁对十二诸侯纪年的整理面临极大困难,实际结果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精密周详。

晋国历史纪年的情况,同样纷繁复杂。《晋世家》说:“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2]1636}从周初唐叔封立到靖侯所在的厉王之世,晋侯不可能仅历“五世”,“无其年数”也只是说见不到相关文献,不代表各位晋侯原无纪年。年代资料的匮乏,在靖侯之前如此,之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若无直接材料可据,仅凭相关年代推算,其可靠性自然不能估计太高。《晋世家》说:“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其文意非常清楚,靖侯十七年即共和元年,但《年表》却列靖侯十八年为共和元年,前后不相照应。若将晋国纪年与后来的出土文献相对照,问题似乎更大。如晋文侯元年,依《年表》在幽王二年,古本《竹书纪年》显示却在平王元年,二者相差10年。古本《竹书纪年》说:

(1)晋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友父伐郟,克之。乃居郟父之丘,名之曰郟,是曰桓公。^{[3]70}

(2)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郟父之丘,是以为郟桓公。^④

这两条材料同记郟桓公伐郟灭虢之事,只是引文方式略异,据此可知晋文侯二年即幽王既败2年(平王二年),表明晋文侯与周平王在同一年即位,并非《年表》所记在幽王二年。此年郟桓公尚未出任司徒,他既不可能以幽王八年才有的司徒身份与史伯谈及东寄孥贿之事,也不可能伐郟而居郟父之丘。故蒙文通先生正确指出:“史公纪晋文侯之年,已先于《竹书》者

且十年。”^{[4]60}如果按照《竹书纪年》所载晋文侯元年即平王元年逆推,加上司马迁所定殇叔4年,穆侯27年,则穆侯即位宣王二十七年。前一年他尚未继位,岂可以穆侯身份主导千亩之战?

新出晋侯苏钟与古本《竹书纪年》的年代指向亦复相同。该钟铭云:“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遘省东国南国……王亲命晋侯苏,率乃师……伐宿夷。”(《近出殷周金文集录》35—36)铭文中的晋侯苏就是晋献侯,即穆侯之父。根据《年表》,晋献侯在位时间是宣王六年至十二年,宣王三十三年晋国之君是晋穆侯而不是晋献侯苏,故有学者认为钟铭三十三年当为厉王纪年^{[5]326}。若然,《史记》所记献侯的年代就错得太离谱了。或以为是晋侯苏即位后追记此前跟随厉王东征时的记录^{[6]10},亦非的当。厉王三十三年是靖侯当政,代为出征的不是其子而是其孙,周天子却几次使用“晋侯苏”的称谓发表命令,即使用后来的身份追述也是不符合周代礼制的。何况厉王三十年实行“专利”,后又利用卫巫“弭谤”,心思也完全不在东国南国的事务上。可见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与周厉王无关,只能是宣王的纪年,而《史记》所推晋侯苏的年代应有舛误^⑤。宣王三十三年献侯苏尚在君位,其子穆侯在宣王二十六年同样不可能以晋师“伐千亩”。

古本《竹书纪年》不只显示晋国纪年存在严重误差,而且还有材料证明千亩之战只有宣王三十九年一次。《后汉书·西羌传》引古本《竹书纪年》说:

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

在这段记载中,有几个关键点须加注意:

其一,“明年,王征申戎”所指为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的千亩之战。由于申与姜戎同为四岳之后,亦是姜姓,故以申戎代称姜戎可,清华简《系年》省称为“戎”亦可。从文献上看,宣王三十九年除了伐姜氏之戎外,别无其他伐戎之举,故申戎只能是姜戎氏的代称。陈槃先生说:“申戎亦姜姓,盖姜戎之别部,故申戎亦可名

姜氏之戎。然曰姜氏之戎、曰姜戎,不即等于申戎。”^{[7]1036}虽然申是申,姜戎是姜戎,但二者血缘上有一定联系,称姜戎为申戎可谓不中亦不远。

其二,此言王破申戎,与《国语》说王师“败绩”不同,胜负双方易主,必有一误。近出清华简《系年》第一章说:“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8]136}是知此役以王师败绩为可信。至于《晋世家》说晋穆侯伐千亩“有功”,是司马迁对《左传》“成师”所作的不恰当演绎,后世学者多不采信,故以“成其师众”^⑥释之。“成师”实际是说此役晋师得以保全,与战争全局无关。此与赵之奄父为宣王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2]1780}一样,虽然宣王成功脱险,奄父有功,但无改于王师败溃的整个结局。

其三,古本《竹书纪年》所言千亩一役,发生在宣王征伐条戎奔戎之后,时间上只间隔两年。而《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所言穆侯伐千亩亦在伐条之后,时间上同样只间隔两年^⑦。裘锡圭先生认为:“彼此显然是一回事。”^{[9]70}洵为卓识。这个证据非常有力,不容别作解释。宣王与穆侯征伐的对象同为姜氏之戎,时间同在伐条两年之后,地点又同为千亩,却偏偏不是同一次战役,事情断不至于如此巧合。司马迁不在《年表》中复列宣王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原因就在这里。

过去,人们对《年表》的误差估计不足,过于相信司马迁对晋国纪年的推定,以至误判有两次千亩之战。今将地上地下各种文献对比分析,证明千亩之战只有一次的结论,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二、千亩之战的地理方位

关于千亩之战的地理方位,晋唐学者先后提出京郊、介休、岳阳三说。京郊说为晋孔晁所倡,他说:“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⑧“近郊”是指周都镐京近郊,大概由推求《史记》《国语》文意所得。介休说来自杜预,其注《左传》桓公二年“千亩之战”云:“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⑨“界休”后改称介休,于今仍为山西县名。岳阳说是唐代张守节提出来的,其依据来自《括地志》:“千亩原在晋州岳阳

县北九十里也。”^⑩岳阳在太岳山南(今山西古县),离介休县一百多公里。明末清初顾炎武说“穆侯时晋境不得至介休”,认为《史记·赵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亩战,应如《史记正义》所言在岳阳县北九十里^⑪。诸家说法虽有不同,但都不曾把千亩之战看作两次,因而才能围绕同一议题发表见解。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晋穆侯“千亩之战”作疏,引据《国语》并作评鹭说:

杜预云:“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则王师与姜戎在晋地而战也。《国语》云:“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而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则晁意天子籍田千亩,还在籍田而战。则千亩在王之近郊,非是晋地,义或然也。^{[10]433}

孔颖达认同孔晁的说法,主张千亩之战地在京郊,无涉晋境,是很有见地的,故能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清汪远孙说:“王自伐戎而远战于晋地,必不然也。”^{[11]21} 阎若璩《潜邱礼记》、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所见略同。其根本依据在于,宣王伐千亩与不籍千亩当在同一个地方,故不可能远至晋地。

清华简《系年》发现后,不少学者觉得“千亩之战”与“不籍千亩”,虽然俱称“千亩”,但其内涵有异,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因而坚持两次千亩之战的说法。《系年》第一章说:

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8]136}

所谓“帝籍”,是指专门为祭祀上帝而设的籍田,又名之曰千亩。汉贾逵即有类似见解:“天子躬耕籍田,助民力也。籍田,千亩也。”^⑫ 简文说商王“不恭上帝”,不敬祀神灵,失去上帝眷顾,故周人得以东进克商,光有天下。宣王不籍千亩,也是不敬上帝的行为,终遭惩罚,结果被姜戎大败于千亩。从表面上看,作为籍田的千亩,与作为战地的千亩似乎意涵不同,不能等视齐观。宋金履祥就说:“《国语》与不籍千亩同事,非也。不籍千亩,天子之籍田也。此千亩,

地名也。”^⑬其实,这是一种静止看问题的思维方法,不免以文害辞。田名与地名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籍田并非普通的小块田土,而是远近闻名的大面积王家田产,久而久之转化为地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是天子每年春耕前要在这里举行籍田礼,田名与地名更容易合二为一。《国语·周语上》言及籍田礼说:

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飧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垆,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

其典礼场面浩大,参与人员众多,天子裸鬯飧醴,百官庶民毕从,最后由庶民完成耕作。由于厉王被逐,籍田礼废,周宣王即位后,不想再装样子,重修籍礼,因而受到朝中大臣的谏阻。只是周宣王过于任性,拒不采纳,籍田之礼最终还是废除了。其后籍田的耕种不再受重视,但千亩作为籍田之名,演变为一个人们熟知的地名则不会无端消失。数十年后,在这里发生一场以地命名的千亩之战,并不费解。

当然,“不籍千亩”与“千亩之战”确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国语》与清华简《系年》之所以把它们编连在一起,并非无原则拼凑,而是时人宗教思维使然。他们认为这两件事都关乎上帝的意旨,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国语·周语上》中虢文公劝谏宣王说:

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

这是说籍田事涉农耕,上帝的祭品,民众的繁衍,国事的供给,社会的和谐,财政的增值,国力的强盛,无不与此息息相关。如果不籍千亩,轻怠农事,必然是“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得不到上帝福佑,也无以使民。因此,千亩之战的失败,时人把它归因于宣王不籍千亩,乃至神怒民困,造成王师败绩的严重后果。在这里,前一个千亩说的是籍田,后一个千亩说的是战场,但地名为其共性。《国语》《系年》中两个“千亩”相承而言,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只能是

同一地点。

那么,这个千亩究意在什么地方呢?由于千亩本为籍田,每年春耕时又要在此举行籍田礼,自然是孔晁所言地近京郊为合理。清人阎若璩说:“此千亩乃周之籍田,离镐京应不甚远。……盖自元年至今将四十载,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战场,故王及戎战于此。”^⑩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此以证千亩地望,并谓:“《括地志》以晋州千亩原当之,殆非。”^{[12]285}蒙文通先生也认为:“惟姜氏之戎于其盛时,来战于千亩,则逼王畿之近地。”^{[4]59}这些都是明达之见。道理很简单,天子举行籍田礼的地方,不会远离京城。盛大的典礼活动,繁复的表演程序,若是远离镐京,甚至跑到诸侯国的领地上举行,不仅劳师动众,操作不便,就是那一份长途跋涉的辛劳也不是王公贵族所乐意承受的。因此,把千亩之战的地理方位定在镐京近郊,远比其他说法合理可信。至于千亩确切位置的考定,则有待更多新材料的发现。

三、千亩之战的起因及影响

发动千亩之战的姜氏之戎,又称姜戎氏、姜戎。姜戎与申、吕、齐、许均为四岳后裔,姜姓部族,是周王朝赖以立国的姬姜联盟的成员之一。此时何以风云突变,致使姜戎与周王室兵戎相见?千亩之役又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国语·周语下》说:“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申、吕虽衰,齐、许犹在。”此言四岳为共工氏从孙,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赐姓立国,以吕为氏。四岳裔氏之国有关、申、吕、齐、许等,但各自的立国时间并不相同。《周语中》说:“齐、许、申、吕由大姜。”意即四国的封建缘于大姜的外戚关系。大姜为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娶自姜姓部族。武王克商,成为天下共主,得以封建外戚齐、许、申、吕四国。齐、许在周初封立,申、吕属于重新册封。《史记·齐世家》说:“(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

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是申、吕立国比齐、许要早,夏商时期即已存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又隐公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是知四岳又名大岳。作为部族名或其居地名的的大岳,其具体方位可由《尚书·禹贡》考知。其文云:“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所涉地名在今晋南及与豫西交界一带。“壶口”在今山西吉县西,以壶口瀑布著称。“雷首”即今山西中条山脉西南端。“太岳”即大岳,指《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彘县的霍大山(今霍州市东南)。《国语》《左传》《禹贡》的著作时代相近,书中所用术语的内涵亦必具有同一性。顾颉刚先生提出四岳不在晋南,而是指今陕西西部陇县一带的古汧山^{[13]40}。其说置《禹贡》等史籍于不顾,也不考虑大禹治水可否在那里与四岳部族发生交集,而是片面强调姜姓族氏初居关中西部,忽略四岳东迁的史实,自然不能动摇传统说法。申、吕作为四岳之后,可能长期居于晋南,后来申国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则迁往与吕国仅一河之隔的陕西安塞以北一带。周宣王时,申、吕又被迁至河南南阳地区,承担“南土是保”^⑪的政治使命。

不过,姜戎氏与申、吕并不同地,而是遥居关中,东西悬隔。《左传》襄公十四年,晋国范宣子对驹支说:“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是说姜戎先祖“吾离”居于瓜州,因受秦人迫逐,才归附晋惠公,东迁晋南。杜预释瓜州在敦煌(即今甘肃敦煌),对此学者多有怀疑。因为瓜州若在敦煌,则与当时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相距三千余里,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秦人何以迫逐姜戎?姜戎遭受迫逐何以不是西去而是东来?这都是难以解释的问题。顾颉刚先生考证说:“四岳所在当即瓜州所在,部族固容有迁徙,要之必仍在关中、秦岭一带。”^{[13]50}顾氏以为四岳即瓜州所在不可遽信,但他说瓜州位居关中、秦岭一带,颇得学者赞同。考古学上把陕甘地区的寺洼文化、刘家文化等看作姜戎文化,即以此故。

《左传》襄公十四年,姜戎氏首领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

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春秋中期，由于秦穆公称霸西戎，追逐姜戎，故被晋惠公诱至晋之南鄙。此前姜戎氏世居瓜州，可能在关中一带。姜戎氏不与四岳其他后裔齐、许、申、吕等国相提并论，不仅因为地域上相隔遥远，也与其未曾册封立国有关，故自称“诸戎”。姜戎氏发展比较滞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⑥，不可能与周王室发生婚媾关系。有学者认为姜戎氏又称“申戎”，即平王所奔“西申”^{[1]573-574}，与史实不符。

姜戎同为四岳裔氏，为何远离四岳立国之地？很可能是四岳部族东迁之时，姜戎氏作为四岳原居地的一个分支，并未随迁。故韦昭称：“姜氏之戎，西戎之别种，四岳之后也。”《潜夫论·志氏姓》云：“炎帝苗胄四岳。”《世本》也说：“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14]555}四岳是炎帝后裔，早先同炎帝一道居于关中。《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与黄帝是由同一母族分化发展而来的两个部族，世有婚媾关系。关于姜水所在，《水经注》卷十八《渭水》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14]442}一般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15]48}。后来，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炎帝部族西以氐羌为后援，不断东进扩张。四岳可能就是随炎帝东迁来到晋南地区的部落之一。四岳东迁之时，另有别支留居关中，后来被称为姜氏之戎。

周宣王时，大力扶植秦国打击西戎势力，以求西部边疆的安定与稳固。《史记·秦本纪》说：“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在周王室支持下，不仅为患已久的犬戎（獫狁）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而且秦人的实力也随之增强，一步一步向东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姜戎连带受到追逐，土地也被侵占，从而与秦人及其支持者周王室之间产

生尖锐矛盾，进而升级为武装冲突。千亩之战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在千亩之战前后，周王朝发起过一连串的伐戎战争，几无例外都惨遭失败。据《后汉书·西羌传》所引古本《竹书纪年》载，宣王三十一年，征伐宁夏固原一带的“太原戎”（亦即獫狁），三十六年征伐中条山一带的“条戎奔戎”，三十八年征伐襄汾、曲沃一带的“北戎”，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均以失败告终。幽王三年，“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⑦。此役不仅周师严重受挫，连军队主帅也战死沙场。可见宣幽时期的伐戎行动，地不分东西，战无论大小，王师屡遭败北，无功而返。

在诸多伐戎战争中，千亩之战的失败后果最为严重。一是周王室在伐戎战略上被迫转入防御，整体上处于守势。千亩之战是姜戎主动发起的军事进攻，否则战事不会在京郊进行。即使后来周军偶有出击，战斗力也不强，乃至军队主帅性命不保。周室军事力量因连年战争受到严重削弱，连保卫镐京的使命也难以承担了。二是破坏了广泛意义上的姬姜联盟。姜戎氏虽然发展滞后，毕竟还是姜姓部族的一支。姬姜联盟长期作为维持西周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础，至此出现不可修复的裂痕。其后申、吕集团的反叛，与此不无关系。三是战事在京郊失败，彻底暴露了西周王朝不堪一击的虚弱面目。此役王师背靠都城，后援强大，又有晋师配合，本来占有绝对优势，结果却出人意料，竟是王师败绩。这就极大地助长了犬戎长期觊觎宗周的政治野心。十多年后，申、缙联合犬戎攻破镐京，赫赫宗周终于一朝覆亡。

注释

①参见（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49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2页。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6-137页。持此说者另有许兆昌、刘涛：《周代“千亩”地望考》，《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刘成群：《清华简与古史甄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③此观点参见：裘锡圭：《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裘锡圭学术文集》（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占奎：《周宣王纪年与晋献侯墓考

辨》，《中国文物报》1996年7月7日；沈长云：《关于千亩之战的几个问题》，《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谢乃和、付瑞珣：《从清华简〈系年〉看“千亩之战”及相关问题》，《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刘光胜：《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④《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语。王国维以为臣瓚是《竹书纪年》的整理者之一，此语当本纪年。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⑤参见裘锡圭：《晋侯苏钟笔谈》，《裘锡圭学术文集》（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伯谦：《晋侯苏钟的年代问题》，《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⑥此句出自《左传》桓公二年孔疏。⑦按宋刘恕《通鉴外纪》将伐条戎奔戎列为宣王三十八年，千亩之战列为三十九年。《今本竹书纪年》略同。伐条与伐姜戎在时间上已无间隔，但千亩之战仍是在伐条之后。⑧《诗·小雅·祈父》正义引。⑨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说：“界休有界山，有绵上聚。有千亩聚，在县南。”司马彪略晚于杜预，基本上为同时代人。说明当时介休有千亩地名为人熟知，故杜预以此作为千亩之战的地点。⑩《史记·周本纪》正义引。⑪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左传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⑫参见《北堂书钞·礼仪部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⑬（宋）金履祥：《通鉴前编》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⑭（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释地余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⑮见《诗·大雅·崧高》。⑯见《左传》襄

公十四年。⑰《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

参考文献

- [1] 杨宽. 西周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方诗铭, 王修龄校注.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4] 蒙文通. 古族甄微[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5]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6] 李学勤. 夏商周年代学札记[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 [7] 陈槃.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 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8]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二[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9] 裘锡圭. 裘锡圭学术文集: 3[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毛亨传, 郑玄笺,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1] 徐元诰. 国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2] 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 [13] 顾颉刚. 史林杂识初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4] 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5]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An Analysis of The Battle of Qianmu

Du Yong

Abstract: The battle of Qianmu was a famous campaign between the Zhou royal family and Jiangshi Zhirong (姜氏之戎) in the later years of Zhou Xuanwang. *The Xinian of Tsinghua's Bamboo Slips* also contained the incident, which caused scholars to argue about the number, location, cause and impact of the war. A careful analysis of all kinds of documents on the ground and underground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two battle of Qianmu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only one actually which occurred in the thirty-ninth year of Zhou Xuanwang. The location of the war was in the suburbs of Haojing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Jin. The war started because the Zhou royal family supported the Qin people in their fight against Quan Rong (犬戎). As a result, Jiangshi Zhirong was forced out by the Qin people and lost their land, which caused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Jiang rongshi (姜戎氏) and the Zhou royal family and escalated into armed conflict. The royal army failed to defeat Jiang Rong's attack, and the emperor fled. The authority of the Zhou Royal Family was discredited, and the position of co-master plummeted. This contributed to the political ambitions of Quan Rong who coveted Zongzhou (宗周) for a long time. More than 10 years later, Shen, Zeng, joint Quan Rong attacked Haojing, Zongzhou finally fell.

Key words: The battle of Qianmu; the number of the war; geographic orientation;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war

[责任编辑/知 然]